

# 学校教育为何成了痛苦的回忆

□ 吴非

广东开平市某校初三学生谢某,因对小学六年级时班主任侯某不满,行刺侯某,连捅十余刀,手段残忍。谢某认为当年侯老师“留堂太多,有些针对我”。今年以来,已有多起学生以暴力报复教师、同学和家庭成员的事件。有关人士批评学校教育注重“育分”忽略“育人”,造成部分学生被“边缘化”,成为“边缘生”,这些需要关爱的学生在家庭得不到温暖,在学校也遭到冷落。(新华社6月28日)

作为极端的个案,也许没有必

要放大其中的意义。但事件的诱因有普遍性。我并不同意“边缘生”的提法,在疯狂的应试教育中受到伤害的,是所有学生,也包括教师。两年前媒体曾报道,南京拉萨路小学两名“杰出校友”借儿童节对母校老师的回忆:撕作业本、罚抄作业、写检讨、暴力体罚、批斗会……那一系列侮辱学生人格的行为骇人听闻。

这两名学生并不是“边缘生”,而是母校老师的骄傲:上了名牌中学、考进“985、211”,都留学世界名校。按中国惯例,两位“优生”应当对母校感恩戴德,对严师无比崇敬,然而,童年的伤痕无法抹去,她们忍耐了十年,终于喷发出来了。问题少年行刺报复小学教师,比较少见;绝大部分在

校受过心灵伤害的学生不会采取过激行为,只是,他会把这些伤害埋藏在心灵深处,并且会对“教育”作出错误的判断。

教育界内部,也仍然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开平市方面介绍,“6000多名中小学教师,仅十多位拿到广东省的A级心理健康教育辅导证”,“学生人数众多,政工教师疲于奔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很被动”,谈的是治标之难。学生工作不能只依靠“政工教师”。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中小学生会有那么多的心理问题?学校和教育部门有没有做过认真的探究?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在这一阶段,只需完成教育,而不得通过考试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可是,

现行的小学和初中教育普遍以过重的作业负担和频繁的考试检测来淘汰学生,用考试分数在心理上损伤,在人格上贬低。“学霸”“学渣”这类词语能迅速在中小学流行,窥一斑而知全豹;“差生”,这个违背教育伦理和职业道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校长教师口中,甚至出现在“经验介绍”或“教育论文”中!童年少年时期在学校遭受的种种人格贬损,学生心理受到伤害,这一时期的幸福快乐被剥夺了,想要忘却,很难。

教师按考试成绩公开排名次,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结果必然会使辱学生;学校考查评价教师,以考试分数决定奖惩和收入,大部分教师没有能力对抗,也没有能力消化

这样的压力,于是把压力转移到学生身上,这些,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其实,“班均分”低两分有什么了不得的?然而学校不这么看,家长也不放过。目前学校的“反教育”现象,教师固然有职业修养方面的问题,但不合理的评价体系要负责,家长也要负道义责任。

专家认为,应当“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相关国家规定的心理健康从业证”,我认为,“不健康”的评价体系才是病根,只有从行政上改变“分数至上”的评价方式,才有可能对教师提“心理健康从业”要求。由此,教师按教育规律办事,不把学生当“产品”而把他们当人对待,不谈“成功”而讲“成人”,教育才会成为生命与爱的记忆。

画里有话



薛宏伟/图

## 受贿“安检”

□ 殷国安

环保部华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督查三处原处长李学智涉嫌受贿罪,2012年9月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认定受贿36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李学智与西城区检察院分别提起上诉和抗诉。2013年12月1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判处李学智有期徒刑14年。(《南方都市报》6月28日)

李学智受贿不算新奇,比较有趣的是,李学智在受贿时做了两件事,倒是很奇怪:一是,李学智首先检查了行贿人的手机通话和短信记录。二是,“进屋后,李学智让其脱衣服洗澡,宋某不愿意,李非得让其脱衣服洗澡。洗完衣服后,李问他钱带来了吗,宋某说带来了在车里。洗完澡后,宋某问要见的领导在哪,李学智说领导又来电话了,有急事来不了,领导让司机来拿钱。”那么,李学智为何要检查行贿人的手机,逼迫行贿人脱衣洗澡?新闻没有交代。我分析,他做这两件事都是

一个目的,防止行贿人秘密录音、录像留下证据。

但是,李学智还是利令智昏。难道只要行贿者不录音、不录像,自己收钱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难道你敲诈勒索,只要矢口否认就可以逃脱惩罚?这也太自作聪明了,法院最后认定,宋某和其司机李某的证言、会议纪要、账目材料、银行账目等能够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事实上,大多数的贪官受贿案,在行贿时也没有录音录像,难道受贿罪矢口否认就可以一笔勾销吗?这样的小聪明还是免了吧。

百姓说话

## 年轻人需从“蜜糖罐”中走出来

□ 戴忠群

人生在世,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年轻人应当珍惜分分秒秒的宝贵时光,努力拼搏,自强不息,为自己的人生铺就金光大道,当你“夕阳下山”之时,再回首,看自己走过的路,将是无怨无悔。然而,当今有些年轻人缺乏奋斗精神,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混天撩日,无所事事,靠父母养活,甘愿做一名“啃老族”,这种状态有失当代年轻人的风范。

笔者一次随团出访美国,当地华人协会会长王女士陪同我们考察,交谈中她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在逆境中成材而自豪,这位华人协会会长家里很富有,名车豪宅一样不缺,但是儿子大学毕业后,母亲马上为其“断奶”,分文不给,让他去独闯“江湖”,刚开始,持有我们中国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传统观念,实在不忍心自己的心肝宝贝露宿街

头,可转念一想,要成材,还是得让他在逆境中去磨练磨练,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于是,有志气的小伙子从送外卖、洗碗刷盘子、做清洁工、搬运工、开电梯等最底层的劳动者做起,在艰苦的逆境中磨练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后来成为一名华人圈里知名的公司董事长,不用“啃老”,而是有能力去孝顺长辈,让老人们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看来,年轻人在逆境中成长是件好事,和在“蜜糖罐”中虚度光阴有天壤之别。逆境培养人锻炼人,不去依靠父母提供的财富,而要完全靠自己努力奋斗,才能求得生存,自力更生,顽强拼搏,在摸爬滚打中赢得做人的真谛,苦尽甘来,获取了丰衣足食,这才是年轻人的追求、年轻人的道德风尚,年轻人的人生价值。相反,如果迷恋“蜜糖罐”式的生活,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自己不去奋斗、自食其力,而要依靠和享受父辈创造的现成的财富,还心安理得,那将是非常悲哀的事,自己的前程会黯然失色。

网言个论

## 高考社保门槛岂能成铁门槛

□ 李英锋

云南考生小王(化名)在今年的高考中获得了理科598分的成绩,比一本线高出70多分,却因为父母是外地户籍,且在云南工作多年没有按时缴纳社保费,可能只能念个三本院校。

限制小王报考权利的是其父母的社保——没有连续6年在云南缴纳社保金的记录。这种限制暴露出有关制度的僵硬和冷漠。诚然,社保门槛能够增强移民考生的真实性,能够维护地区高考秩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社保门槛不能成为“铁门槛”,也应该在尊重事实、不纵容功利型高考移民的前提下具有合理适度的制度柔性。

社保门槛的制度柔性不是随意性,不代表乱开口子、乱施人性、乱坏规矩,而是对那些确实已经取得本地户籍和学籍多年、在事实上已

经与本土考生无异、其他证据足以排除高考移民嫌疑的考生,酌情降低社保门槛或撤掉社保门槛。

这样做,就要求其他证据资料更全面、更详实、更准确,要求招生部门、教育部门在审查把关时更有责任心,要求把特例情况公开,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督,从而避免制度柔性成为制度漏洞,避免一些高考移民钻空子,避免一些审核人员权力寻租、失职渎职。

小王的父亲在云南经商已经二十多年,小王从幼儿园起就在云南念书,户口初二就迁到了云南。小王早就成了云南人,根本就不是高考移民,这一点已经无须再用小王父母的连续6年缴纳社保金记录来佐证,小王理应获得与其他云南考生一样的完全报考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依然用父母缴纳社保金记录的缺失来限制小王的报考权利,人为地剥夺了一个不错分数的小王进入更好大学的机会,罔顾事实,违背了择优选才、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也违背了社保门槛设置的初衷。

近日,山东省拟定禁止“啃老”入法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掀起了对“啃老”现象的新一轮讨论热潮。“啃老”现象太普遍并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因素,中国的家长往往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和照顾,而没有给孩子独立发展的空间,以至他们即使长大成人,在心理上也很难真正成熟,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认识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社会没有给教育生产线上,每年数百万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的岗位和足够均等的发展机会,在就业难和高房价的压力下,“啃老”成了一些年轻人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各位读者,你如果对“啃老”问题颇有感触,欢迎拿起笔来,写出你的心声。来稿邮箱: zzwbsy2013@163.com

晚报观点

## 杨六斤剧情逆转伤害了谁

□ 陈方

广西14岁男孩杨六斤的故事继续发酵,不过剧情逆转令人意外。记者调查发现,杨六斤并不像此前媒体报道的那么惨:他不是独居6年,而是25天;吃野菜当地居民常有,杨六斤只是吃得更多一点。更重要的是,杨六斤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补助,还有低保及公益基金支持他。

爹死娘嫁,杨六斤确实是个苦孩子。问题是,苦孩子是个普遍现象,不具备独特性。如果仅仅是个普通的苦孩子,杨六斤的命运还会不会发生逆转?如果没有“独居6年”“吃野菜充饥”等细节,他会不会在经历见诸媒体后,迅速聚集500余万元善款?

媒体最初报道杨六斤遭遇时,初衷可能是善意的,为了帮助这个苦孩子,不惜放大他的悲

情与苦楚,也取得了引发关注的效果,迅速改变了杨六斤的生活。可是,引起公众强烈同情和吸引大量捐款报道,经过再调查,却有较大出入,这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杨六斤的剧情逆转伤害了谁?

此前,我们还在为500万元的善款而感动,如今这笔巨款却成了“烫手的山芋”,很多人会质疑,如果杨六斤没有此前报道的那么惨,那么他是否“配得上”这500万元善款?今后,公众再看到类似新闻时,还能否毫不保留地奉献爱心,他们会不会去怀疑报道是否有夸张作假的成分?

杨六斤报道引发的起伏跌宕的剧情让人无比感叹。如果说最初的报道引发公众捐款热潮是第一季,深圳“抢人”的误解是第二季,对杨六斤生活境遇的真实还原则是第三季。

公众更为关心的是,这部剧集到底该如何画上句号。500万善款怎么办? 隆林族自治县政

府表示,这笔巨额善款将完全尊重杨六斤及其监护人的意愿,确保每一份爱心善款都用在杨六斤的学习生活上;关于杨六斤的去留问题,也将充分尊重杨六斤本人的意愿。

至此,杨六斤的故事并未结束。反观众多由苦难引发的慈善,几乎都遵循着这一规律:媒体设置议题,悲情的故事带来海量的捐款。善良的人们通过最质朴最简单的捐款来表达爱心,此外少有其他渠道。同样以杨六斤为例,公众都在忙着捐款,没有谁能规划下一个孩子的成长到底需要多少钱,除了钱之外还需要什么资源。捐款是最简单的方式,但也是原始的盲目的。如果能有一个值得公众信任的机构或组织,去引导人们实现更高层级的慈善,那么很多慈善行为中的尴尬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

如何做慈善,怎样的慈善才能不伤害公众的爱心,杨六斤的故事又给媒体和公众上了一课。